

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學圖書館藏明清沿海輿圖概述

孫靖國

內容提要：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學圖書館藏有十餘種沿海輿圖，時段由明代中期直到清代末期。本文結合這批輿圖收藏的來源，選取其中價值較高的12種，敘述其描繪內容，考定其年代，並評價其學術與史料價值。

關鍵詞：明清 沿海 輿圖

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學圖書館（下稱科圖）雖然以國家科技文獻收藏中心而馳名學界，但曾經屬於綜合性收藏單位，所以仍然擁有相當數量的古文獻，其中包括一批明清輿圖。在館藏輿圖中，沿海輿圖是一個重要的門類，由明代中期至清代末年均有收錄，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反映了明清時期中國沿海地區的海岸、島礁、風向、洋流、物產、港口、航路、政區建置、居民分佈、社會風俗、軍事佈防、地緣政治理念，明清政府對周邊海域的管轄、治理、建置，以及相關時期我國官方與民間在沿海地帶的活動等多方面內容的歷史信息。本文將結合相關史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敘述和解析科圖所藏12種明清沿海輿圖描繪的內容，考證其繪製年代，並對這批輿圖在中國地圖史上的地位與價值進行評析。

一、科圖藏輿圖的來源

科圖的主要前身是日本庚款組織“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所舉辦的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①20世紀20年代初，日本政府迫於國際和國內的壓力，決定參照美、英等國的先例，將“庚子賠款”的一部分退還給中國，並趨向於由日本政府將這筆鉅款用於在中國從事文化事業等。1923年3月下旬，日本衆議院和上議院先後通過了《日本對華（支那）文化事業特別會計法》。此會計法共10條，自大正十二年度（1923）施行。其第5條云：“本會計法以關於下列事業之諸費為歲出：1. 關於在中國所辦教育、學藝、衛生、救恤及其它助成文化事業。2. 對於在留日本之中國人民所辦與前項所舉同種之事業。3. 於日本所辦關於中國之學術研究之事業。”1924年2月6日，中國駐日本公使汪榮寶與日本對華文化事務局局長出淵勝次根據前面提到的所謂《特別會計法》在日本東京簽署了協議書，即《汪公使與出淵局長瞭解事項覺書》。此協議書共9條，其第3條云：“在北京地方設立圖書館及人文科學研究所。”在此前後多次會議與磋商的基礎上，1925年，先是成立了“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委員共18人，中方為柯劭忞、熊希齡等11人，日方為入澤達吉等7人，其第一次總會議即規定：“（一）依

《對華文化事業特別會計法》規定，每年應支出250萬日圓。內中由庚款收入者172萬日圓。(二)前項172萬日圓內，用於中國國內之文化事業費約100萬日圓。目下所有北京、上海之研究所及北京圖書館，由民國十三年至民國十八年止，六年繼續費之預算共計決定金535萬日圓。”

1927年12月20日，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在王府井大街大甜水井胡同9號成立，總裁為柯劭忞，副總裁為王樹枏與服部宇之吉。次年，該所又成立了“東方文化事業圖書籌備處”。^②人文科學研究所由於經費充裕，主持得人，幾年間搜集了二十餘萬冊古籍，其中“頗多稀見珍貴又具學術資料價值的品種，書品亦佳”^③。根據民國二十七年(1938)該所編印的《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書目錄》，從民國二十五年(1936)十月末開始，該館共收藏中文輿圖90種，其中清代繪本地圖18種。^④而從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至民國二十八年(1939)三月，該館又補充輿圖3種，^⑤其中並無民國以前繪本。現科圖收藏的《榮澤汎民墊現在河勢情形圖》亦標有“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1號)”字樣，則應是在1939年之後入藏。《直隸通省要緊各河發源歸宿淀泊達海情形全圖》附有“國際文化振興會(日本東京)”信封，上用藍色硬筆豎書圖名。應該也是這一時期入藏。抗戰勝利之後，這批圖書歸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科圖圖書的另一來源，當是成立於1936年7月的北平近代科學圖書館。該館以搜集日本各方面的科學著作、研究報告、統計資料為主。在此次整理過程中，發現《京師內外城馬路全圖》、《繪呈藍家垵圖說》、《湯山圖》、《[穆宗梓宮安奉陵寢路程圖(自白潤至桃花寺)]》、《宿衛第一標守衛禁城及海牆各地段略圖》等輿圖都係北京近代科學圖書館收藏。

抗戰勝利後，這些藏書歸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49年，部分精品被運往臺灣。^⑥根據該館收藏的一份民國三十七年(1948)編製的《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書目錄》的史部地理類“地圖”部分來看，當時共收藏各類地圖近300種，其中可以確定為明清繪本的有80種，有相當一部分不見於今天館藏^⑦，很可能被運到臺灣。

中國科學院接收圖書工作分別在北京、上海等地進行，其中北京部分較大宗的有以下幾次：1. 解放後接收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書328914冊。這應該是建館時中文輿圖的主要來源；2. 1954年接收北京工業學院撥贈前中法大學藏書61000冊；3. 1954年北京對外貿易學院撥贈海關總署收藏的地方志1300種，共15000冊；4. 1955年財政經濟出版社撥贈藏書24000冊。^⑧後三次中也可能有部分中文輿圖。

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向科學進軍”的號召，中國科學院院部批准了一筆追加預算，大量採購書刊。其中就包括古籍搜集工作，十年間共補充二十餘萬冊，約占1993年時館藏古籍的40%以上。^⑨在筆者的整理工作中，就發現在《銅山海口港汊地輿圖》上貼有“中國書店定價箋”，並記有“以上圖一次購入8幅，每幅¥5.00”字樣，《淮北水陸透私圖》有“1957年購”，《黃運兩河全圖》有“購自中國書店”等記錄，都應是於此次搜集而來。此後，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工作日益獨立，相信科學院圖書館不會再有大規模搜求中文輿圖，尤其是古地圖的活動。

根據筆者的整理與統計，科圖共收藏沿海輿圖16種。本文選取其中價值較高的12

種，分海防圖、沿海圖、海塘圖和港口圖四種類型，對其進行考定和研究如下^⑩：

二、海防圖

1. 江防海防圖

該圖用彩色繪製；紙本長卷，縱41.5厘米，橫3367.5厘米，錦緞裝裱，無圖題與繪製者。圖書館著錄為今擬名。

《江防海防圖》自右向左展開，自江西省瑞昌縣開始，卷首已殘，可辨識“此口湖廣等處”字樣，卷尾為福建流江水寨。地圖描繪了自江西瑞昌向東至上海吳淞口，再轉而向南，自金山衛至浙閩交界處而止的沿江、沿海地區的山川、城邑、墩臺、烽埃、沙洲、島嶼等地物，內容相當豐富。該圖採用形象畫法，各種類型的地物都有較一致的繪製方法，介於寫實與符號之間，如一部分城垣用上面繪有門形符號的立面圓形表示，而另一部分卻描繪成平面的方形，若非忠實反映形制的差別，那就可能具功能上的區分之意。此圖明顯為海岸與內河防禦所用，所以對水中的島礁、沙洲、橋梁等記錄甚詳。在州縣、衛所等較大城堡中，多注有與相鄰政區的距離，體現了中國傳統輿圖的實用性。正是由於地圖的實用性，所以本圖並未使用固定的方向，而是將長江與海岸作為基準線，方向隨長卷的展開而轉換。在江防部分，圖卷自長江上游向下游展開，按照水流的方向，長江右岸總是在圖卷的上方，左岸總是位於圖卷的下方。而沿海部分，則海岸總是位於圖卷的上方，海洋總是在圖卷的下方，反映繪圖人是從行船的視角向岸上眺望。這體現了中國古代繪製長卷式輿圖的傳統方位和表現形式。

圖上靖江縣已出現，但其縣境仍為一沙洲。曹婉如先生根據《明史·地理志》，“成化八年（1472）九月，以江陰縣馬歇沙置。大江舊分二派，繞縣南北，天啟後，潮沙壅積縣北，大江漸為平陸”，而圖上靖江縣仍在沙洲上，又圖中有太倉州，推測：“此圖繪製年代應在太倉設州的弘治十年（1497）至天啟元年（1621）之間。”^⑪

2. 福建海防圖

明代萬曆中期（1597—1604），佚名彩繪，紙本長卷，縱41厘米，橫580厘米，原為經折裝，後改為卷軸裝，每幅紙縱41厘米，橫21.5厘米。原圖無圖題。

該圖呈從右向左“一”字展開式。圖中對海岸線進行了特殊處理，即海洋及近海島嶼在上方，而陸地則在下方，可見其視角為從大陸看海洋。圖中所表現的地理範圍，南起福建與廣東交界的柘林灣、南澳島，北至浙江南端的南麂島。除閩浙、閩粵交界地區和臺灣以外，圖中還描繪了呂宋、琉球等地，但就其主要內容來看，還是以描繪福建沿海的山川形勢和軍事駐防為主。

《福建海防圖》採用形象畫法，以中國山水畫形式表現了福建沿海等地的陸地、山脈、河流、海洋、島嶼、城邑、驛站、邊墩等內容，為典型的寫實手法。陸地的顏色依高度而標成不同的顏色，低處為黃色，而山體多標為青色，並在若干山峰處畫有樹木。如果標繪樹木與否代表植被覆蓋程度的差別，本圖將是復原歷史時期福建沿海地區自然環境的珍貴史料。海水繪有平緩的波紋。表現河流所用的波紋與海水一致。入海處大都繪有橋梁，但多不標名。府城、衛、所和巡司駐所都用城樓符號表示。縣城也大多用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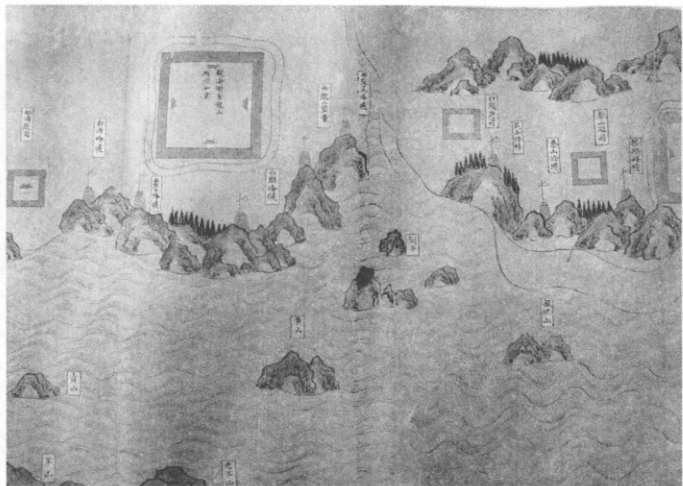


圖1 《[江防海防圖]》之“觀海衛”部分

樓符號來表示，只有福清縣與長樂縣以青色方框表示，並在四方標有城門，不知道這種特殊標注是否意味着城牆形態的區別。文字注記均括以紅色方框。海邊各墩均標有黃色旗幟。驛站用紅色方框，內畫鋪房的形式，注記沿途里程。另外，凡沿海港灣、巡司，多注記可以停泊船隻的數目、兵卒的數量或到達附近駐防地的行程長短。水路按“一潮水（約三十里）”或“半潮水”計，陸路則記里程數。

圖中文字注記所記載多是明朝嘉靖、萬曆年間之事。卷尾臺山處標注記載：“此山聳出海外，山嶺石崑，故名爲臺山。北去南鹿一潮水。倭來首經於此，固入閩第一關也。萬曆二十五年（1597）設遊擊督汛防守於此。汛畢掣回沙埕防禦。但兵船雖爲臺山而設，而澳不便於南風，兵船憚於遠涉，少到。若常守，倭來無不知矣。”另外，澎湖於萬曆三十二年（1604）被荷蘭所佔據，但圖中並未提及此事，在澎湖處的標注仍集中在抗倭事宜，建議“我守之以制倭，倭據之以擾我，此必爭之地”。可知此圖很可能繪製於萬曆二十五年之後，三十二年之前。

3. 山東登州鎮標水師前營北汛海口島嶼圖

清代佚名彩繪，紙本折裝，共6折，每折縱35.3厘米，橫17.8厘米；封面、封底紅色綾裱，黃色題簽。

該圖以山東省登州府（治今蓬萊市）海岸爲中心，着重描繪了西起虎頭崖（今屬萊州市），東至威海口成山角（今屬榮成市），北至北陸城島（今屬長島縣）這一地區的海岸、河流、登州府城、天橋口城，以及島嶼。其中標繪島嶼甚詳，海水用雙綫網狀波紋表示，綫條爲綠色，島嶼多繪製爲山形，唯獨桑島繪成臺狀，以突顯桑島的平坦。



圖2 《福建海防圖》卷首“閩廣交界”處

從虎頭崖向西，還繪製了丁河口與大沽口，距離甚短，不成比例。全圖以海為上方，以陸地為下方。圖中有貼紅四處，分別標注了從天橋口出發，向各個方向行船的航線與距離，說明登州鎮標水師前營北汛的負責地域範圍，圖中航行路程以“更”為單位，每更合60里。

圖中貼紅文字為：

自天橋口起往東至八角口三更船，八角口至芝罘島一更船，芝罘島至養馬島一更船，養馬島至劉公島四更船，劉公島至成山頭三更船，自天橋口起往東至成山頭止，共十二更船。每更計路六十里，共計水路七百二十里，迤東係本營東汛洋面。

自天橋口起往東北至大竹山島八十里，往東北至小竹山島九十里，往東北至紗帽島一百里，往正北至長山島四十里，往西北至小黑山島七十里，往西北至大黑山島八十里。

自天橋口起往北至廟島一更船，廟島至砣磯島一更船，砣磯島至欽島一更船，欽島至隍城島一更船，再往北一更半船止。自天橋口起至隍城島往北，一更半船止，共五更半船，每更計路六十里，共計水路三百三十里，迤北係關東旅順洋面。

自天橋口起往西至黃河營一更船，黃河營至紀岫島一更船，紀岫島由三山島至小石島二更船，小石島至虎頭崖三更船，虎頭崖至丁河口四更船，丁河口至大沽河一更船，自天橋口起往西至大沽河止，共十二更船，每更計路六十里，共計水路七百二十里，迤西係天津交界。

清軍入關之後，就沿明制在登州設置水師，順治元年（1644），於登州設立水師營，置守備、千總等職，有“沙虎船、邊江船十三艘，水兵三百八十六人，駐紮水城，分防東西海口”。以後歷有更迭：

（順治）十五年，移沂州鎮於膠州，改膠州水師為陸營。十八年，移臨清鎮於登州，以隸屬城守營之水師，改為前營水師。康熙四十三年，增設遊擊二員及守備以下各官，增水師為千二百人，改沙虎船為趕繃船二十艘，分巡東西海口，東至寧海州，西至萊州府，分為前後二營，各專其職。四十五年，以前營水師移駐膠州，巡哨南海，後營水師駐水城，巡哨北海。五十三年，裁後營經制員弁，裁水師七百人，撥趕繃船十艘赴旅順口，僅存前營水師遊擊等官，趕繃船十艘，分南北二汛，以遊擊、守備分轄兵船之半。雍正七年，每船增兵十人，兩汛共增兵百人，增雙篷船七艘，每船配兵三十人，南汛船三艘，北汛船四艘，北汛增將弁一人。九年，又增設船三艘，增兵一百九十人，每船船共配兵四十人，南北汛各五艘。十二年，增將弁六人，又於成山頭增設東汛水師，抽撥南北汛趕繃船各一艘，雙篷船各一艘，分配戰守兵，撥南北汛將弁四人，配船巡哨成山、馬頭嘴一帶，與各汛會旗，總歸水師前營管轄，以本鎮統之。列定制於後：

前營水師，遊擊、守備各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外委千總二人，外委把總四人，水戰兵八百人，守兵二百人，趕繃船十艘，雙篷船十艘，每船各帶腳船一艘。南汛駐膠州之頭管子，遊擊一人，把總二人，外委千總、把總各一人，趕繃船四艘，雙篷船四艘，共配戰守兵四百人，南境巡哨至江南交界之鶯遊山，東至榮成縣馬頭嘴，與東汛會旗。東汛駐養魚池，千總、把總各一人，外委千總、把總各一人，趕繃船四艘，雙篷船四艘，共配戰守兵四百人，南境巡哨至馬頭嘴，與南汛會旗，北境巡哨至成山頭，與北汛會旗。北汛駐登州府水城，中軍守備、千總、把總各一人，外委把總二人，趕繃船四艘，雙篷船四艘，共配戰守兵四百人，南境巡哨至成山頭，與東汛會旗，北境巡哨至陸城島，與直隸水師、盛京水師分界。^②

鴉片戰爭之後，清朝海防的缺陷日益明顯。為加強對山東海域的管理與巡視，道光二十二年（1842），山東巡撫托渾布與登州鎮總兵玉明上書，力陳登州水師兵力不足，海防鬆弛，“請增水師官兵，以為奉、直兩省聲援也。查東洋據天津上游，為奉天延後，登州府城東北陸城島以外一百八里洋面與奉天各半分轄，為南船赴奉、直要路，尋訪內盜，固以此為先，而備夷，尤以此路為全洋關鍵。其地屬水師北汛所轄，該汛分管洋面一千八百里，現惟守備一員、把總二員、外委一員，戰守兵一百八十七名，實屬不敷巡防”。為解決這一問題，他們主張增設水師後營：“於登州添設後營遊擊一員，定為水師題缺，歸登州鎮管轄。以北汛守備改作遊擊中軍守備。此外，再添設千總一員、把總二員、外委四員、額外外委五員、戰兵三百二十名，守兵八十名。除東汛仍隸前營外，後營遊擊責令督防北汛。其應管洋面自登州城外天橋口以東至成山汛為東路，天橋

口以西至直隸交界之祁河口爲西路，天橋口以北至隍城島外奉天交接洋面爲北路。原額弁兵分巡東、西兩路，增設弁兵分巡北路，遊擊統轄三路，駐紮登州水城。守備專領北路，駐紮長山島。”^③

這一建議後被採納，則最早從道光二十二年開始，登州鎮水師便分爲前後二營管轄，北汛亦由前營而轉隸後營。而從圖中貼紅注記與繪製內容來看，仍屬前營，則此圖應繪製於增設東汛的雍正十二年至道光二十二年之間，反映了1734年至1842年這一時間段內清代對渤海灣南部海域和海岸的管轄與軍事佈防，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並對《清史稿》等史書起到了補充作用。

三、沿海圖

1. 中國沿海七省八千五百餘海哩地圖

該圖爲紙本彩繪長卷，縱31.2厘米，橫1290.4厘米，無比例尺與方向標。

《中國沿海七省八千五百餘海哩地圖》卷首爲東半球地圖，圖題爲“天下總圖”，之後爲中國沿海圖，右自盛京、鴨綠江口，左至防城、交趾界；沿海圖後附有臺灣圖、臺灣後山圖、澎湖圖、瓊州圖等。本圖採用鳥瞰式的視角，在略帶曲面的海平面上審視陸地，所以陸地恒在上，海洋恒在下，並無固定方向。圖中山脈、河流採用形象畫法，河流繪製成傳統的寬度誇張的雙曲線，河流與海洋顏色一致，差別是海洋有海浪形波紋。府州縣城用藍色“回”字形表示，衛所城用紅色圓點表示，沿海的島礁、沙洲都一一標示，島礁繪成綠色陡峭山體，沙洲則用赭黃色描繪，並比較平坦，部分島礁與沙洲呈向圖兩邊傾倒狀，似是表示航路兩側。圖上有多處大段文字注記，詳細描述沿海各地區的海岸、航路、島礁、季風、洋流等影響航海與防禦的資料。圖末附有《東洋記》、《東南洋記》、《南洋記》、《小西洋記》、《大西洋記》、《崑崙》、《南澳氣》等陳倫炯著作。

圖中“寧”字不避諱，繪有乾隆三十八年（1773）設置的“海寧州”，臺灣諸羅縣尚未改名嘉義。若此處確係實錄，則此圖表現的時代應爲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二年之間（1773—1787）。而跋文將原圖作者陳倫炯，號資齋，誤寫成“資濟陳公”，表明此圖屬於摹繪品。而圖末落款時間“丙寅冬仲”的跋文，很可能是後世所補。

因而，圖中標出諸多衛、所，多係順、康、雍朝已經裁撤者，與此圖表現的年代不一致，也能夠說明該地圖爲坊間私自繪製所致。

2. 沿海全圖

清代彩繪本，紙質，長卷，縱29.9厘米，橫688.6厘米。

卷首爲“四海總圖”（東半球），後爲沿海圖、臺灣圖、臺灣後山圖、澎湖圖、瓊州府圖等圖。是陳倫炯《海國聞見錄》系列衆多摹繪品之一，但圖上無圖題、標注、圖說。卷尾附有大段圖說，長達114.3厘米。圖說字跡潦草，懷疑是私人臨摹之作。

圖說之後，另有一段題記，其文曰：“檢閱圖志，當是康熙、乾隆時作。其時臺灣歸順，故圖志及彭題均特別加詳。按圖志係陳公手筆，爲海防所必需。方今臺灣收入版圖，沿海均屬國疆，朝夕批圖，增我興趣不少。——乙酉冬，程峻僧借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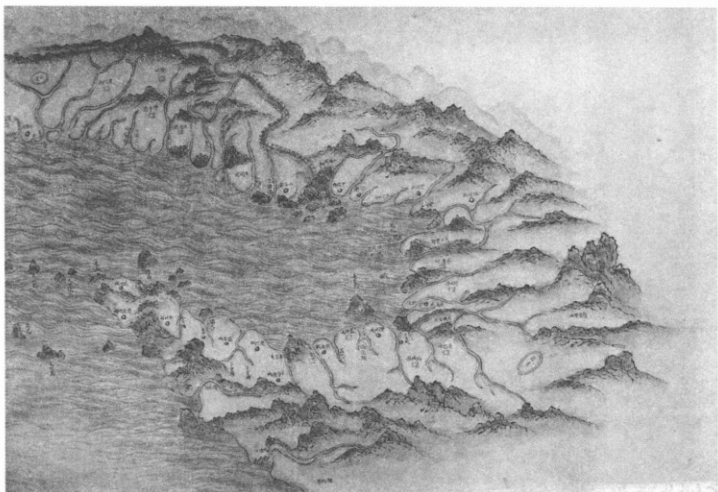


圖3 《中國沿海七省八千五百餘海里地圖》之遼東半島部分

題記中提到“康熙、乾隆”，可見程氏生活於乾隆朝之後，且圖中“寧”字均已避宜宗諱改為“甯”，該圖至少應繪製於道光朝以後。再查程峻僧，很可能即程嵩齡，字峻生，號峻僧，祖籍安徽休寧，先世在太平天國戰亂中避居泰州，應宣統己酉科考得授巡檢，愛好搜集古物，著有《獲室泉幣考》、《獲室詩文存》等，1951年去世。則此“乙酉”年，可能是1945年。該年抗日戰爭勝利，也與題識中的“方今臺灣收入版圖”有所呼應。當然程峻僧明言此圖係“借觀”，也很難分辨是繪製於道光朝之後的哪個時期了。

3. 東邊轄境全圖

清光緒初年陳本植繪製，官繪本，紙本彩繪，單幅，縱126厘米，橫210厘米，無比例尺，四邊標有方向，有圖例，圖右側豎書圖題。

該圖描繪東邊兵備道所轄的鳳凰、興京二直隸廳境內的山川、州縣、城邑、兵營、道路、名勝古跡、港灣等地物。該圖圖例完備。作者注記為：“此圖以紅綫為分界，紅點為道路，其朝鮮貢使所經則另用黃點別之，仍將邊內邊外繪出邊柵，新設道員、同知、州縣駐所及分防縣丞、巡檢衙署並各邊門均用紅簽分注，惟永陵、行宮等處悉用黃簽恭注。”

圖左有作者署名：“二品銜分巡奉天東邊兵備道陳本植恭繪謹呈。”陳本植字海珊，“籍隸四川合江縣，咸豐舉人。光緒初元，由直隸知府奏調來奉辦東邊善後事宜。時陳季青初平劇盜，間間凋敝，公悉心籌劃，稟請開墾東邊，置通化、懷仁、寬甸、安東四縣，招練軍三營，分布駐紮，以鎮餘匪，改岫巖通判為岫巖州，設興京、鳳凰二廳。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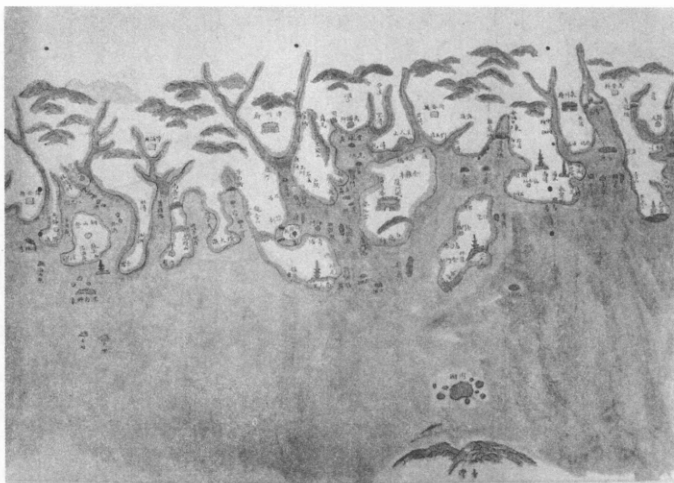


圖4 《沿海全圖》之福建沿海部分

緒三年（1877），請置道員統轄。朝廷即以公任之，兼奉天全營翼長，督理中江稅務，旋以文教未昌，請學額，修文廟，建書院，東邊人民於以進化，復創設牛痘、留養等局，民多霑惠。公明斷如神，吏無敢欺，凡所措施，無不如志。光緒九年（1883），卒於奉天旅次，邑人建遺愛碑，昭其政績”^④。

圖中所繪政區，多在光緒二、三年中設置，其中東邊道、寬甸縣、通化縣、懷仁縣都設於光緒三年，所以該圖的繪製年代，上限應在光緒三年，下限則應在光緒九年陳本植撤職，而最有可能是就是在光緒三年，陳本植為說明新設的東邊道的情況而繪製。

圖中文字注記豐富，包含比較豐富的歷史信息。如在洋河口處標注“大孤山海口，此口水勢較深，現時載運數百石船隻可以進口，若千石以上大船隻能停泊口外，裝卸貨物仍須用本處小船撥載”。在大莊河處標注“大莊河一名鮑家馬頭，居民鋪戶約二百餘家，由市集南至海口計十五里，舊為商船彙集之區，近因河口淤淺，大船不能進口，糧貨出入必用小船撥載”。清代前期，遼東口岸、稅關主要設於山海關、金州等處，東邊各口岸並未加以管理。隨著與關內各地貿易的發展，到乾隆中期，岫巖轄境各海口每年都有一定數量的商船停泊，輸入布匹和瓷器，輸出大豆和雜糧。貿易量相當可觀。地方土棍豪強、貪官污吏們相互爭奪以中飽私囊。地方政府甚至已經暗地收取船規，張士尊稱之為“定額關稅”。^⑤正因為此，乾隆三十三年（1768）在岫巖廳所屬鮑家碼頭、尖山子、沙河子、英納河、青堆子、大孤山、紅旗溝等七處海口設立稅局，徵收稅銀。

但正如陳本植在《東邊轄境全圖》中所分析的，大孤山與青堆子由於河口淤積，碼頭不斷向外推移，最終因無法停泊大船，逐漸衰落。成書於民國十年（1921）的

《莊河縣志》記載：“本境所屬商鎮，堪稱繁盛者有三：一治城、一青堆子、一大孤山，而大孤山鎮尤爲繁盛。查該鎮於數十年前輸入之貨，由江南杉船每年入口者不下數百餘號，輸出之品，即大豆一宗可至四十萬石有奇，以故商業繁興，爲東邊冠。清咸、同間，幾與營口齊名。迄今世變時移，商務日形困頓，殆有二因，一因於安東之開埠，一因於洋河之淤淺。安東之開埠，交通四達，東邊一帶之需要，皆捨孤而就安；洋河口淺，輪運不便，南來入口之貨物，必價值增而銷路滯。此地理變遷，所以影響於商業也。”^②

四、海塘圖

下列五種輿圖存於同一函中，皆爲清代彩繪，經折裝。從形制上來看，屬於隨奏摺上報的附圖。從內容上來看，此五幅輿圖所描繪的都是同一區域，即杭州灣北岸，具體來說，是從杭州至海寧州的小尖山。爲防禦錢塘江的擺動和海水的倒灌，歷代在此處修築海塘，清代對此亦相當重視。此五幅輿圖就應是當時負責此事的官員向中央彙報時所繪。

從繪製方式來看，此五種輿圖也存在相當的一致性。全部右起浙江省城（杭州）的六和塔，以錢塘江爲中心，橫互紙面，一直到海寧州的小尖山與塔山一線，所以圖的方向爲上南下北。五種輿圖都用形象化的符號法表現地物。杭州城和海寧城都描繪爲帶有鳥瞰式透視效果的城垣，並象徵性地描繪出雉堞和城門，祠廟、塘汛等用簡單的建築形式表現，山脈也帶有山水畫的風格，反映了清代中後期官繪海塘輿圖的總體風格和繪製手法。

1. 浙塘簡便圖

清乾隆、嘉慶時期（1759—1820），絹底彩繪，6折，每折縱31.2厘米，橫10.8厘米，圖總橫長65厘米。該圖對錢塘江兩岸的自然地物描繪較詳，細緻標出江岸的堆沙和江中的沙洲，如杭州城南的“頭堡老沙”和“新沙”用不同顏色區分。對兩岸山巒標示亦很細緻。

圖中繪出乾隆五年（1740）閏六月建成的塔山壩^③，而錢塘江江漕取道海寧州城北大門，說明此圖繪製於乾隆二十四年（1759）之後^④。圖中“寧”字都不避諱，可見此圖繪製年代應在道光朝之前。

2. 東西兩塘海塘全圖

清乾隆、嘉慶時期（1740—1820），紙本彩繪，52折，每折縱28.3厘米，橫11.2厘米，圖總橫長582.4厘米。圖中詳細標注出杭州至海寧尖山的各塘字號，在仁和、錢塘二縣交界處，分別用千字文向東西排列。

仁和、海寧、海鹽、平湖四縣的海塘字號立於乾隆二年（1737）；圖中亦畫出了塔山與小尖山之間的塔山壩，則此圖應繪於乾隆五年以後。圖中“寧”字都不避諱，可見此圖繪製年代應在道光朝之前。

3. 光緒柒年拾壹月分浙江省海塘沙水情形圖

清光緒七年（1881）繪製，共8折，每折縱19厘米，橫8.5厘米，圖總橫長68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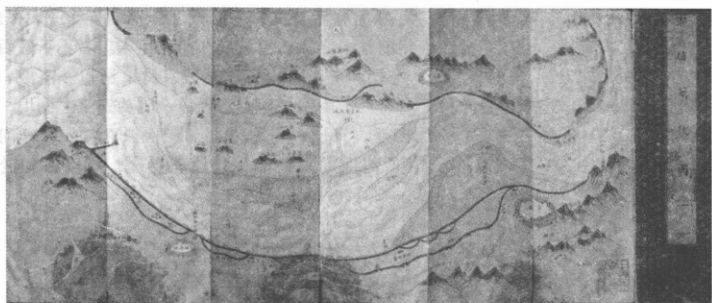


圖5 《浙塘簡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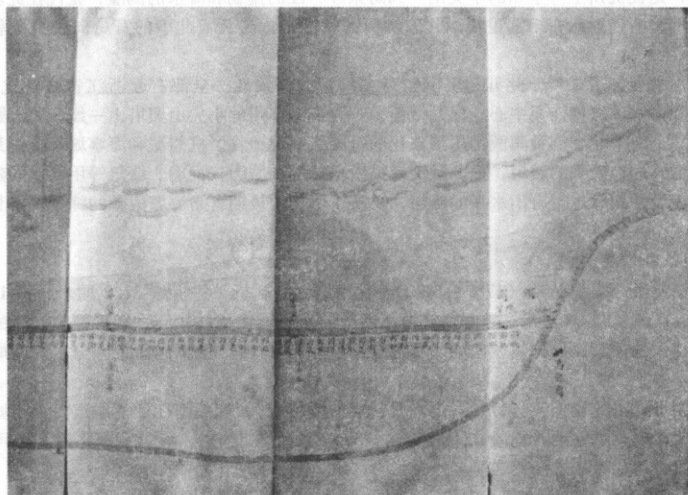


圖6 《東西兩塘海塘全圖》局部

米。封面、封底用黃絹裱糊，圖題用墨筆直書於其上。圖中杭州與海寧的城垣用藍色填塗，不繪雉堞與城樓，南岸塗以淡青色，北岸塗以淡赭石色，河道與兩岸堆沙繪以灰白色，用顏色的濃淡進行區分，山巒則用形象畫法，塗以鮮綠色。

圖中詳細標示出海塘工程的各堡，不同的工程也用不同顏色區分開來。在圖中有多處貼黃，報告錢塘江水勢與沙洲的進退情況，可見當時監管海塘工程的官員的工作重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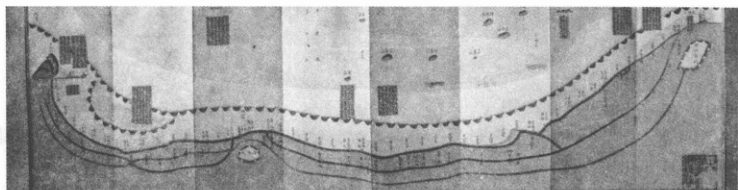


圖 7 《光緒柒年拾壹月分浙江省海塘沙水情形圖》

4. 光緒柒年拾貳月分浙江省海塘沙水情形圖

清光緒七年（1881）繪製，共 8 折，每折縱 19 厘米，橫 8.5 厘米，圖總橫長 68 厘米。描繪地物基本與《光緒柒年拾壹月分浙江省海塘沙水情形圖》相同，唯貼黃中所講述沙水情形略有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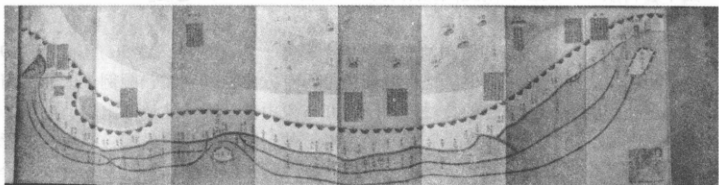


圖 8 《光緒柒年拾貳月分浙江省海塘沙水情形圖》

5. 光緒叁拾叁年拾貳月分浙江省海塘沙水情形圖

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繪製，共 8 折，每折縱 19 厘米，橫 8.5 厘米，圖總橫長 68 厘米。除首尾裱以紅絹以外，表現方法、風格與前兩圖基本一致，只是因為此圖與前二圖相隔 20 餘年，所以色彩新舊有別而已。從字跡上來看，前二折出自一人之手，而此折出自另一人之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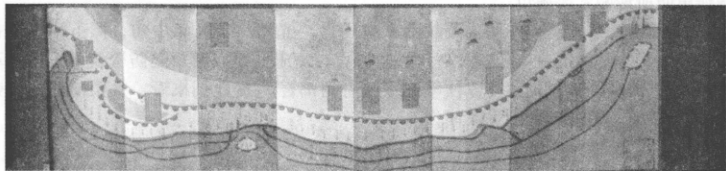


圖 9 《光緒叁拾叁年拾貳月分浙江省海塘沙水情形圖》

此三圖貼黃中多次提到與上月情況的比較，可見至少在光緒一朝，海塘的沙水變化情況需要每月呈報。

五、港口圖

1. 銅山海口港汊地輿圖

清中後期（1800—）佚名彩繪，紙本單幅，縱68.3厘米，橫114.2厘米，圖背貼紅題簽，方位標於四隅，上東下西，視角上是以海為上方，從陸地角度看海洋。

該圖以福建省詔安縣東山島為中心，運用形象與符號結合的技法描繪詔安縣沿海的山川、城堡、村落、軍事建制、海岸、島嶼等地物，頗為詳細，地名方位並不固定，應是以航路為中心向兩岸審視。此圖文字標注非常詳細，尤其突出表現描繪內容的海防價值，如在村落、汛址、城堡旁詳細標注距海岸里數，在塔嶼上方標注“浦詔二縣水程交界，以塔嶼之北屬漳浦，塔嶼之南屬詔安，塔東則係汪洋大海，一望無際”。在港口處，往往會記錄漲潮退潮時的水深與是否可停泊的關係，水的深度用“托”來衡量。

圖中雲霄鎮已升為廳，則此圖應繪製於嘉慶五年（1800）之後。

2. 象山港圖

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常榮清彩繪，紙本單幅，折裝裱糊，縱56厘米，橫79.5厘米，計里畫方，每方五里，但陸地上並無畫方，有方位針、圖說、圖例，上北下南。

該圖運用形象與符號結合的技法描繪了浙江省象山港及附近陸地的山川、港汊、城邑、海岸、島礁、道路等內容。山脈為綠色山形符號，陸路為赭色虛線，河流為淡青色雙曲線。航道按深度分為兩種，五拓（一拓為六尺）至十拓者用黑色虛線表示，十拓以上者用夾雜較大黑點的黑色虛線表示。縣界用紅色實線，沙灘用黃色以與陸地區分。圖中詳細地標示出了象山港兩岸的港汊，在主要交通路綫旁用文字標注其起止與重要性。

圖左為圖說，詳細記敘了象山港的各種資料，指出周邊治所城鎮都離港較遠，只有大嵩所城〔此所於順治十七年（1660）裁撤〕較近，可通小輪。民船可以在漲潮時分，通過沿岸的若干處沿小河達各城，但不能通兵船。圖說又特別指出，象山港“斜繞甬郡，南面岸闊水深，外無關鍵”，外國兵船在冬季習慣在港內停泊，威脅寧波安全，是“籌辦甬防所最關緊要處也”。

此圖繪製精審，便於實用。圖說落款處題為“光緒二十九年月中旬，標下衛隊哨長常榮清謹繪”。常榮清一直任寧波一帶駐防軍官，清末任寧波新軍巡防營統領，辛亥革命時支持革命黨，革命成功後曾任寧波軍政府副都督。^⑩從此圖來看，常榮清是一位兼具軍事知識與愛國情操的優秀軍官。

六、科圖藏清代沿海輿圖之地位與價值

中國向來被認為是一個內陸國家。許多人認為：未能重視海洋權益，是阻礙中華民族走向近代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在歷史上，中國對本國沿海地區的瞭解與探索卻從未中斷，留下汗牛充棟的相關文獻。在這些資料中，地圖具有獨特的直觀性，包含着豐富的信息，其信息量遠遠超過同樣幅面的文字說明，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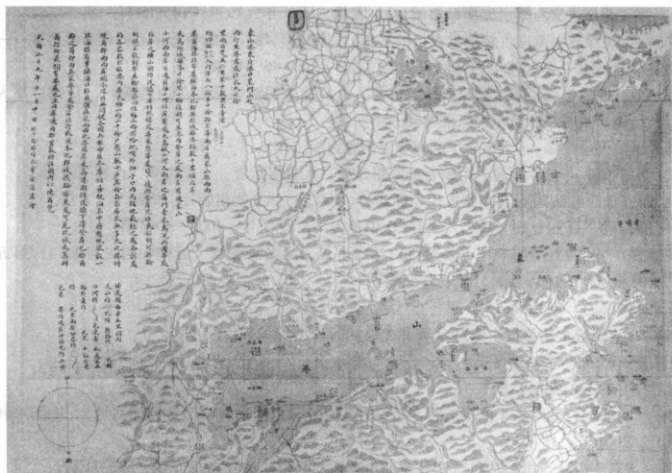


圖 10 《象山港圖》

科圖所藏的十餘種清代沿海輿圖，反映了明代中期迄清代末期中國沿海地區海岸與海域的水文情況、水利工程形態以及明清政府對領海、沿海地區及港口的管理體制，是瞭解中國明清時期海防建設、航海技術和海洋管理制度的一手史料，在中國海洋史和軍事史中都具有重要價值。另外，科圖所收藏的部分私繪沿海地圖，表現了當時中國人對於中國海域的認識程度，在中國地圖史和地理學史上也具有一定的地位。

[本文係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2006年度重大項目“中國古地圖的調查、整理與研究”(項目批准號:06JJD770002)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明清沿海地圖研究”(項目批准號:12CZS075)的研究成果之一。筆者在寫作過程中，得到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諸先生最熱忱的幫助，成一農亦對本文加以賜正，尚此致以謝忱!]

注釋：

- ① 孫穎、徐冰：《“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籌建始末——20世紀上半葉日本對華文化侵略之典型一例》，《求是學刊》2007年第5期，137—142頁。
- ② 羅琳：《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編纂史紀要，《圖書情報工作》1994年第1期，45—50頁。
- ③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中文古籍善本書目·前言》，科學出版社，1994年。
- ④ 《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書目錄》史部地理類九地圖，第81頁左至第85頁左。
- ⑤ 分別為民國二十五年禹貢學會影印明萬曆本《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日本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編《東亞大陸諸國疆域圖》(日本昭和十二年印本)與《北京四郊古圖》(民國二十六年摹繪)

本)，據《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書續目》，民國二十八年（1939）刊，15頁。

- ⑥⑨ 李曉亞：《深層次處理古籍文獻書目的思考》，《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的創新性發展——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2003年度學術年會論文集》，2004年，47頁。
- ⑦ 手抄目錄，藏於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學圖書館。由於很多明清輿圖並無明確圖題，其題目為入藏時暫擬，所以無法將目錄與今天館藏輿圖一一對應。
- ⑧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編：《十年來中國科學院的圖書館工作》，1—3頁。
- ⑩ 本文所引輿圖，若無原圖題，由筆者或圖書館編目人員擬定者，一律在文內作相關說明。
- ⑪ 曹婉如：《江防海防圖》，《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卷），文物出版社，1994年，1頁。
- ⑫ 《清史稿》卷一百三十五《兵志六水師》，中華書局，1977年，4002—4003頁。
- ⑬ 文慶等纂：《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六十三，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五十六輯，文海出版社，1966年，5165—5172頁。
- ⑭ 民國《鳳城縣志》卷九《人物》。
- ⑮ 張士尊：《清代盛京岫巖口岸考》，《東北史地》2010年第4期，84頁。
- ⑯ 民國《莊河縣志》卷十《實業》。
- ⑰ 《兩浙海塘通志》卷六。
- ⑱ 《故宮水利檔案》乾隆二十四年五月。轉引自陶存煥、周潮生《明清錢塘江海塘》，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2001年，18頁。
- ⑲ 樂承耀：《辛亥寧波光復紀略》，《中共寧波市委黨校學報》2001年第6期，69—71頁。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